

《为人民服务》蕴含的党内政治文化

□ 万晓庆

1944年9月5日，中央警卫团战士张思德在工作中为救战友不幸牺牲。三天后，在为张思德举行的追悼会上，毛泽东发表了演讲，后来题为《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稿不足千字，对党的建设的作用却极为深远，因为这篇文稿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的核心价值。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

价值观决定着政党的行为方式，一个政党没有核心价值观就没有灵魂，其行为必然是盲目的。70多年前，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前响亮地喊出“为人民服务”的口号，绝非空洞的说教，而是对中国共产党核心价值的凝练。其后不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被确立为党的根本宗旨。随着时代的发展，对“为人民服务”的内涵不断丰富和发展。从“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再到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中国梦”，“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最大的追求”，这些论述，既体现了理论创新的过程，也体现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新要求新期待的过程，其实质还是“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

“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

人无完人，政党也是一样，世界上



没有不犯错误的政党，关键是要看如何对待自己所犯的错误。首先，中国共产党敢于直面错误。毛泽东指出：“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这是共产党人对待错误的态度。其次，中国共产党勇于修正谬误。从认识和实践的关系来讲，坚持真理的过程必然是不断修正谬误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历史伴随着不断修正错误、克服自身缺点、整顿党的作风、改造我们的学习。最后，中国共产党真心实意把话语权、评判权交给人民，鼓励人民说真话，做到“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

革命时期，“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当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目标而奋斗，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各种社会矛盾纷繁复杂，党所担负的任务一点不比过去

轻，而且更重了。这就要求全体党员要把责任担在肩上，敢于担当，不怕牺牲。在今天这样的和平建设年代，关键是要敢于担当。如果口头上高喊“为人民服务”却又放不下个人的“坛坛罐罐”，那就失去了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就不可能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中国共产党人“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在革命年代，共产党的队伍中“官兵平等”，反对一切特权，党的队伍成为充满凝聚力的战斗堡垒。当前，我们要认真贯彻《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对待组织和党内同志，要光明磊落、不搞小山头、小圈子；同志有错，“拉拉袖子”“治病救人”；党的干部要乐于“牺牲小我”、甘于“清贫”，关键时刻“身先士卒”。

中国共产党人勇于修正错误、敢于担当牺牲、对同志如春风般温暖的行为特质，都源于“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应该说，中国共产党能在近现代历史发展中脱颖而出，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发

展前进的领导力量，得益于党在成长中形成的优良政党文化基因。政党文化的形成非一日之功，往往要经历长时间的孕育、提炼、强化，最后成为文化基因，成为党员的行为准则。文化基因的“变与不变”与时代的发展、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中国共产党经历了近百年的风雨历程，经历了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整个社会文化都面对着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共产党原有的优秀文化基因同样存在变异的危险。最容易产生的变异，首当其冲的是价值观的变异，在一些党员干部那里，“为人民服务”扭曲为“为人民服务”扭曲为“为人民服务”。这两种价值观，虽然仅有一字之差，却谬以千里。价值观是“总开关”，理想信念出问题，行为规范自然有偏差，而这些失范的行为最后都会在党内政治生态中反映出来。因此，习近平总书记

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强调，要注重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

设。这就需要我们坚定理想信念，扎紧制度之篱，杜绝歪门邪道，进一步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重读经典

有一种大美叫把“冷板凳”坐热

□ 虞云耀

因工作关系我认识了文秀同志，对他的真正了解还是他的文章。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篇言论文章，说有一种大美，叫把冷板凳坐热。坐冷板凳不易，几十年一以贯之更不易，而要把它坐热尤其不易。

我经常在《人民日报》《求是》上看到文秀的文章，这些短小精悍的言论文字，正如他的名字，有文采，很灵秀。他能把政论文章写成了美文，既有思想性，又有可读性，平实中见波澜，随意中见功力。不经意行文、不刻意作文，不见痕迹、没有雕琢，看似平常却不平凡、看似简单却极深刻，好像京剧中的慢板唱腔，踱着方步行云流水，颇具高手气质。文秀的文章有自己的风格和特点，既接“天线”，站位高、看得远，又接“地气”，立足实、很有生活气息；既直面问题、振聋发聩，有很

强的针对性，又娓娓道来，广征博引、洋洋洒洒，似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既讲大局大势大事，有一种大格局、大视野和大脉络，又谈做人做事做官，体现一种人生价值、精神追求。他的文字鲜活生动清新，笔端常常沾着泥土，笔尖往往带着露珠。读文秀的文章，不乏一种享受。

我愿意为文秀的这本书作序，还在于他的激情和他身上所散发出来的精气神。在23个月的时间里，他竟然在《人民日报》发24篇文章，再加上在《求是》《学习时报》和其他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两年不到的时间，共有60余篇之多。这种“井喷式”的“拼命”努力，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难怪乎听他自己说，平时睡觉时他会在床头柜上放上纸笔，有时半夜会突然醒来，想起好题、好词、好句，便干脆挑灯而作，近乎一种痴迷状态。我曾做过多年科研工作，深知要成就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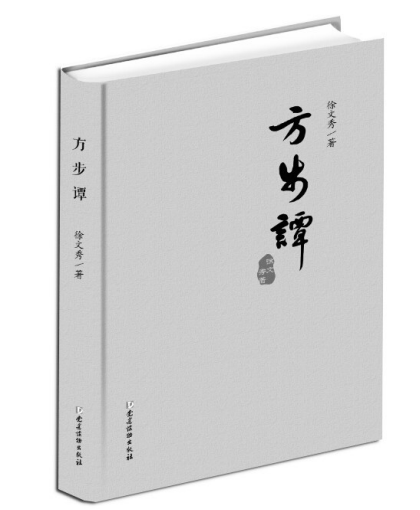
番事业，这种痴迷精神弥足珍贵。

做文字工作是一件劳心劳力的苦差事，它需要耐得住寂寞、挡得住诱惑、静得下心神、坐得住冷板凳。文秀同志说，他是“以文为生”，把写文章、爬格子，作为自己的生命之源、生存之道和生活之味。我想，这是一种心态，也是一种境界，一种对党的事业的热爱，一种对人、对己、对社会的责任。文秀同志把写文章的秘诀概括为八个字：“兴趣、勤奋、坚持、得法”，其实后面是“担当”两个大字。

古代先贤有言：立德、立功、立言乃人生之“三不朽”。古往今来，这成了一代又一代读书人和为官从政者的一种价值追求。文秀同志向往之，祝愿他一直高举着思想的火把前行。

是为序。

（注：此文系作者为徐文秀新著《方步谭》所作的序言）



序与跋

一部权威实用的党内法规词典

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石，是可靠、有效、持久的治党方式。《词典》对党内法规进行了梳理和诠释，初步展现了科学完备、层次清晰、运行有效的党内法规体系。总的来说，《词典》有以下几个特点：

权威性。《词典》主编叶笃初是中国共产党党章研究领域的专家，出版了《中国共产党党章史略》《新党章新思考》等党章研究专著，其专著《党章论》是党章学的奠基性著作。《词典》编撰缜密，系统地阐释了党内法规的重要条款，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词典》尽可能地

把建党以来党制定的主要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包括党章、准则、条例、规定、办法、细则等都编辑在册。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当前党内法规制度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不配套、不适应、不协调、不衔接、不一致等制度短板也日益凸显。这些问题有损于党内法规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有碍于党内法规制度的贯彻执

行，也不利于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顺利推进。《词典》的面世将会有助于上述这些问题的解决。

时代性。语言变化背后是时代脉搏的跳动。任何一个新的词语诞生，都是社会变革及时代进步的直接、迅速而集中的表现。也许这些语言最初出自一种感受、动议或是习惯，一开始仅是有限流传，随着事物的发展与共识的增加，就会成为人们普遍认同和接受的通行语言，成为广泛交流与公认的工具。《词典》中编进一些党内日常生活或网络流行的“新词”“热词”，显得很接地气。以党建类专业性辞书来论，1989年叶笃初曾出过一部《党的建设辞典》，相距近30年后，如今又出版了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词典》。《词典》以独特的辞书形式与语言风格，从语言形态上或是描述、或是解读，乃至引经据典、说文解字，反映了党的建设和全面从严治党

的伟大历程。《词典》涉及的党内法规领域条目，包括最新论著（文献）、最新观点（论断）、最新法规、最新语汇（包括短语、词组）乃至党内

日常生活习惯词语，例如“党务公开”“竞争上岗”“党内和谐”“反腐倡廉建设”“两新组织”等，均是近年使用频率较高词语，均有确定或较确定的解释、用法以及延伸意涵，使得《词典》具有明显的时代性。

实用性。编纂一部方便读者使用的党内法规词典一直是许多党史、党建和法律词典编纂者孜孜以求的目标。《词典》兼顾了容量较大和体积适中的双重优势，所列条目，涉及的党内文献跨越95年，总计1320条，83万余字。全书分五个部分：法规理论、法规文件、法规实务、法规话语和党内法规大事记略。书最后附有词目拼音索引，方便读者查找使用。

我们相信，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新变化，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必定不断取得新进展，《词典》也将被不断修订、不断完善。

书海泛舟

深化全面从严治党，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要求党员干部认真参加党内政治生活，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使“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成为常态。只有自觉加强党性修养和道德修养，对自身的

优劣长短特别是缺点毛病保持自知之明，党员干部才能自觉防“病”。

现实中，人们最忌惮的事情就是生病，最忌讳的是别人知道或别人说自己有病，最大的毛病就是不知道或不承认自己有毛病。这看似人之常情，实则危害极大。《说文解字》中说：“病，疾加也。”病，一般是指人在生理上或心理上出现异常的症状，轻者影响人的身心健康，重者则可危及人的生命。相对于人们肌体生理上的疾病，除了少数不治之症外，人们心理上、思想上的毛病往往危害更大、更难以治理。先贤圣哲们指出的为政者在求知为学和修身处事方面常犯的几种毛病，值得今人反思。

“不知”之病

道家创始人老子说：“知不知，尚（通‘上’）矣，不知知，病也。圣人

“病舍其田”

孟子说：“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守约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带而道焉；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于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轻。”（《孟子·尽心下》）孟子认为，言语浅近而意义深远的，是善言；操守简约而施与广博的，是善道。君子的言语讲的虽是平常之事，却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君子的操守从修养自身开始，最终追求的是使天下太平。孟子指出，人们的毛病往往在于放弃自己的田地不去耕种，却跑到别人的田里去除草——要求别人很多、很严格，要求自己却很少、很轻松。现实社会中，确实有那么一些人，自己的本职工作没有做好，却老是插手别人的事务；自己不去干事创业，却惯于在别人背后指手画脚、评头论足，竭尽嘲讽甚至诬陷之能事。那些“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者，其实是没有注意看看自己田里有没有杂草，而把眼睛只盯在别人的田里。所以才会出现“所求于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轻”的情况，结果是“荒了自己的地，种了别人的田”。这些“瞒心昧己”的人，就是孟子所诊断出的病人。正常的人应当是先种好自己的责任田，求实务本，然后才去推己及人，正己而后正人。

讳疾忌医

法家集大成者韩非讲过一则典故说，名医扁鹊去拜见蔡桓

知病才能防病

公。他在桓公面前站了片刻，便对桓公说：“主公有病，病在皮肤，若不及时医治，恐怕要严重起来。”桓公一听，便有些不快，摇头说：“我身体很好，没有病。”扁鹊走后，桓公对左右冷笑道：“这些医生就喜欢医治没有病的人，以显示自己的医术高明。”过了十天，扁鹊又去见桓公。观察他的气色后说：“主公有病，病在血脉，若不抓紧医治，将会更加严重。”桓公听后十分不乐，扭头不理。扁鹊只好退了出来。过了十天，扁鹊又去见桓公，心情沉重地说：“主公有病，病在肠胃，再不医治，将更加严重！”桓公听后，勃然作色。扁鹊喟然长叹，摇头而去。又过了十天，扁鹊第四次去见桓公，一见桓公，二话没说，转身就走。桓公觉得蹊跷，派人追问。扁鹊痛心地说：“病在皮肤，可用药水热敷；病到血脉，可用针灸治疗；病入肠胃，可用汤药；现在病入骨髓，已经没有什么办法了。”过了五天，桓公浑身疼痛，赶忙派人去请扁鹊，扁鹊早已连夜逃往秦国了。很快，桓公就死掉了。故事结尾，韩非总结说：“故良医之治病也，攻之于腠理。此皆争之于小者也。夫事之祸福亦有腠理之地，故曰圣人蚤（通早）从事焉。”（《韩非子·喻老》）所有的问题，都应赶在刚露细小苗头时及早加以处置，才能防患于未然。韩非借上述典故说明“有形之类，大必起于小；行久之物，族必起于少”的道理，并以此解读《道德经·第六十三章》所谓“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后人由此典故提炼出成语“讳疾忌医”，指隐瞒疾病，不愿医治。比喻掩饰缺点、错误，不愿改正，结果因小失大。

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倡导“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党的优良传统。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关键还在于党员干部个人要有良好的党性修养、道德修养和自觉遵纪守法的意识，尤其要对自己的缺点毛病保持自知之明，并努力克服之。即老子所谓“圣人

知病才能防病

干部国学苑



□ 常光明

“事必有法，然后可成。”由叶笃初等主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简明词典》（以下简称《词典》）面世了。《词典》的出版，对进一步增强党员干部“四个意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制度建设永无止境。党内法规是管党治党的重要依据，是规范党组织的工作、活动和党员行为的党内规章制度的总称。加强